



她选择和中国人民在一起

——评长篇报告文学《信仰照亮生命——伊莎白与兴隆场》



李炳根

加拿大籍女性伊莎白·柯鲁克的百年中国生活与经历，是一个神话般的传奇。这个传奇，既高端，又灿烂，十分吸引人们关注。但伊莎白自己却说：“我没有那么伟大，就是每次都选择了中国，选择留在自己喜欢的地方，选择和喜欢的人民在一起。”

伊莎白1915年出生于中国四川成都，父母都是来自加拿大的传教士，父亲曾参与创建华西协合大学并在这里担任了系主任。她的大部分童年和少年都在这里度过，从小她便发现自己与周围中国人的生活有所不同，这使她对置身其中的中国社会生活产生了好奇和兴趣。即使后来在加拿大的6年学习，先获得了多伦多大学文学学士学位，后又获得儿童心理学硕士学位并辅修了人类学专业，依旧没有动摇她了解中国社会的愿望。再加上自己崇拜英国社会人类学家，由此产生对社会人类学的强烈兴趣。在她的人生可以有多种选择的时候，她坚定地选择了在中国的乡村进行社会学调查，并以此作为人生重要的事业方向。

重庆作家张莹新近出版的长篇报告文学《信仰照亮生命——伊莎白与兴隆场》，着重书写的就是伊莎白当年在重庆璧山兴隆场做社会人类学调查时前后的情形。

但是，张莹的作品不是简单直观的、一成不变的历史事件、人物事

迹报告，而是努力在人物的过去行动中，找寻一种精神和力量的来源，深度挖掘人物的精神内核。为什么伊莎白在原本生活优渥的环境情形下，喜欢并决心走向艰苦的人类社会学这条人生事业道路，使其成为终身安顿的精神和力量源泉？作者的理解就是“信仰照亮生命”。在这部作品中，作者深入仔细地探讨和感受伊莎白信仰建立的初始和形成过程，较好地证明了伊莎白对中国人民的大爱和纯粹善意的情感，继而生成自己的事业理想——努力改变中国的社会面貌并有所作为。作品的这个书写追求和实践，是很有意义的。这是报告文学出发和归宿的地方，是作者有作为的表现。作品不光使伊莎白的当年生活得到真实立体的再现，也将书写的生命精神价值推向了现实的人生高度，具有强烈而鲜明的当下意义。

伊莎白的生命追求和信仰形成，这一切都是受到当时社会环境状况影响的。在上世纪40年代前后的中国，伊莎白看到现实社会中的战争、贫穷、疾病、饥饿、流落与失败，也看到这个社会的贫富差距、等级悬殊，认为要改变这些现状，就应该好好研究这个社会。在强烈的悲悯责任心和炙热的情怀下，研究和努力改变当时的中国社会面貌成为伊莎白的理想事业，信仰的阳光照亮了她的前程。

书中，我们看到伊莎白不顾父母担忧，独自走进川西大山深处的理县八什间，在藏羌地区开始乡村调查的艰辛情景；看到伊莎白走进璧山兴隆场参加由晏阳初推动、孙思三负责的“乡建合作试验”项目，同俞锡珪、李文锦等人一起，开展仔细深入的社会调查，先后接触到童养媳、寡妇、地方权贵、土匪、巫医、神道人等。伊莎白在这里看到了不

幸和悲惨，看到了愚昧和落后，她在这里创办识字班扫盲、开展科学接生宣传等，但最后却是“无法挽回的失败”，只好“黯然告别兴隆场”。伊莎白亲历调查获得的这些社会信息，非常真实具体并珍贵，是中国当时社会生活的缩影，也是战时中国农民状态的缩影。兴隆场调查的失败，对于伊莎白是有很大挫折感的。她不明白，为什么他们如此的热情投入和用心工作，却无法抵御黑恶势力的侵犯，更无法使百姓告别贫穷、改变苦难的命运生活。但兴隆场的经历，对伊莎白是一次生命的淬炼，也是人生的洗礼。兴隆场的实验项目虽然失败了，但她的信仰依然未变，寻找理想脚步更加坚定了。进而，作者追随伊莎白的行踪不断深入挖掘，继续探求。

这部作品尽管着力于“伊莎白与兴隆场”的前后关系，完整地还原了伊莎白与兴隆场的传奇关系。但是，作者并未死死盯着伊莎白在兴隆场的活动而忽略她对信仰的追求。作品在描绘兴隆场艰辛曲折之后，正在焦虑、困惑之时，伊莎白结识了她后来的丈夫大卫·柯鲁克这位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在恋人加同志的交往中，伊莎白彻底明白了，对于当时中国这个几乎腐烂的社会制度，“改良”已经难以救治疾病，只有通过“开刀”，以革命的方式才能被解救的道理。因此，伊莎白与柯鲁克走向婚姻的同时，也共同选择留在在中国、积极参与中国革命的新道路。他们一起投入到中国的解放斗争以及后来的新中国建设事业，成为中国人民的知心朋友、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作品的这些内容，并不是走题破框，而是伊莎白信仰坚定成熟的有力印证，很好地说明了信仰与生命的良好互动结果。作品使读者看到，伊莎白从重庆璧山

兴隆场一路走来，走到北京，是信仰的坚持，是理想的追寻，也是生命的升华，见证了这位一生爱中国的伟大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的存在。

可以说，《信仰照亮生命——伊莎白与兴隆场》是一部在对特殊人物历史事迹的追踪报告中，展示出信仰力量的作品。作者在深入调查论证的原则基础上，真实地还原描述了伊莎白的当年经历和后来行动，十分具有启示性和感人力量。书中，作者在自己采访叙述的同时，还以章末加注的方式，提供相关的人文内容和信息，对于明晰事件人物和相关内容，具有极好的辅助作用，足见作者写作的用心。此外，作品语言质朴简洁，含蓄蕴藉，具有鲜活的现实感，又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兼具散文笔法和诗意图写特点。这些都有力说明，这部报告文学绝不是追风听声的媚俗之作，而是一部具有历史深度和精神高度的作品，是以高洁的人物精神和情感行为昭示人们的优秀作品。它是信仰的旗帜，是人生的榜样！作品的后部分，与前部分形成映照，既写出伊莎白对兴隆场的一生之爱，与兴隆场人民的深情厚意，同时投射出兴隆场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某种角度上说，这种变化，是中国农村的缩影，也是当下乡村振兴战略正在全面高效推进的缩影。

作者是报告文学创作队伍中的新成员，能够在纷纭的社会人生题材中，选择这样的对象，并投入感情地深入采访书写，这是很难得的。“信仰照亮生命”，希望人们在伊莎白的灿烂人生经历中，得到启示和力量，实现生命的辉煌。

（作者系报告文学作家、文学评论家，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原常务副会长）

写在茅奖边上②

【作品简介】



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2007—2010)《推拿》是当代作家毕飞宇创作的长篇小说。这部近18万字的小讲述的是一群盲人推拿师内心深处的黑暗与光明，这也是国内少有的以盲人群体为题材的文学作品。本着对盲人群体最大的尊重与理解，描述了一群盲人按摩师独特的生活，细微而彻底，真正深入到了这部分人群的心灵。小说以很小的切口入手，以“沙宗琪推拿中心”里的一群盲人的生活为中心，去触摸属于黑暗世界中的每一个细节，并对盲人独特的生活进行了透彻、全面的把握。

单士兵

黑暗世界，边缘人生；创伤隐痛，守护尊严。

人间不值，人间失格，这两个热词，常被用来感叹对社会和人生的失望。不可否认，现实之中确有命运不济和社会不公，让生命难以承受生活之重。

不过，只有热爱生活的人，才能真正被生活热爱。人间烟火漫卷，红尘恋恋不舍，那是因为生活多姿多采，生命极为深刻。人间值得，就是要让所有人都看到光，看到色彩，走向有光的所在，拥抱五彩斑斓的生活。

有些人，就生活在无边的黑暗中，命运随时被抛在某个边缘地带，生活常处在无尽疼痛之中。谁给他们的生命之光，社会温暖和精神治愈？

作家毕飞宇的《推拿》，就是在关注盲人群体，透视那个没有光的世界，来求解被黑暗遮蔽的人生难题。

小说家毕飞宇，能满足人们对文人作家的所有期待和无限想象。如果“江南才子”这样旧式文人身份用起来不显流俗的话，那毕飞宇无疑就是最为与之适配的。南京是一个极具文化江南气息的所在，毕飞宇、苏童在这里吸纳了江南古典的气韵风度，不论是形貌气质还是作品价值，都是那么美好，那么深刻。

在《推拿》之前，毕飞宇的《玉米》《青衣》《平原》等作品，就有着浓郁的古典气息，仿佛每个字句都被传统文化浸染过。而到《推拿》则不一样了，毕飞宇一头扎进了盲人狭窄逼仄的黑暗世界，以压抑的笔调，探索着人性的幽暗，叩问着世道人心，展现出作家“介入现实”的强烈批判意识。

《推拿》获得茅奖，本身就是国家文学奖评选的一次价值升级。它意味着，文学价值不必完全体现在宏大叙事上，文学表达也不必都追求所谓的史诗式呈现，好的作品也未必一定要打着鲜明的主旋律烙印，只要真正回到文学的轨道上书写真实生活，哪怕是聚焦边缘地带，只要能引发反思和改变，就同样能获得国家文学荣誉的垂青。

毕飞宇曾在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任教，对盲人心理特性自然有所研析。后来，他因伏案写作导致身体劳损，到盲人推拿中心进行治疗，与盲人有了近距离的频繁交往，进而更加了解这个群体的生存状态。由此，他用《推拿》打开一扇通往黑暗世界的窗口，让人们感受到盲人承受的隐秘疼痛。

从这个意义讲，《推拿》并不只是在写盲人，而是在通过盲人眼和人类社会进行灵魂对望，来展示盲人“边缘社会”与“健全人主流社会”之间的二元对立。正如余秀华用诗歌的批判力量，证明脑残比脑瘫更丑陋可怕，毕飞宇用小说的反思精神，证明了盲比眼盲更无知危险。

真正一流的小说家写作是难以被定义的。对毕飞宇小说的文本和结构，如果简单地套上某个理论框架，其实很容易陷入尴尬的错位。《推拿》就是这样的作品，全书除了开头的引言和尾声，每个章节都是以人物命名，以一幅盲人浮世绘来展露他们隐秘的心理历程。只有成熟的小说家，才能完成这种层层叠加的“心理叙事”潜性结构。

当然，毕飞宇小说最具魅力的，是语言铺陈。他的文字是内敛的，又是奇瑰的；是隐忍的，又是锐利的；是绵密的，又是简洁的。《推拿》里的字句辞章，就像是附在通往盲人黑暗世界道路边上的萤火虫，是发光的，是体贴的，是精准的，是有生命的，映照出一条条狭窄的通道，让我们跟着盲人，走向他们惊心动魄又波澜壮阔的世界。

比如，毕飞宇这样描述失明的痛苦：“后天的盲人必须要做一件事，杀人。他必须把自己杀死。这杀人不是用刀，不是用枪，是用火，必须在熊熊烈火中翻腾。他必须闻到自身烤肉的气味。什么叫凤凰涅槃？凤凰涅槃就是你得先用火把自己烧死。”这样的句子，让一种绵绵不绝的隐痛，从纸面传递到读者指尖，顺着经脉，直抵心尖，成为一根坚硬的刺，深深地扎进去，带来强烈的悸痛。

这样的语言极其复杂，又极具辨识

触摸疼痛，从黑暗世界走向有光的所在

度，体现了无与伦比的智性与想象。这不是训练形成的手艺，而是天赋的才情。面对这样极具才华和想象的语言表达，任何模仿复述都会有强烈的挫败感。正因如此，《推拿》被改编成同名电影和电视剧，虽然也很大，但一个导演，一万个编剧，都无法还原毕飞宇以文字呈现的心理细节和反思力量。

在《推拿》中，毕飞宇狠狠嘲讽了现实社会对待盲人群体的轻慢、歧视和掠夺。健全人经常对残疾人说，你们要“自食其力”，自我感觉真是好极了，似乎只有残疾人需要“自食其力”，他们就可以淡定地啃老，从容地躺平。那种以优越者自居的心态，那种以施舍者自居的同情，对盲人造成的心理伤害已经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

《推拿》里的王大夫，天生全盲，父母把万千宠爱给了健全的弟弟。王大夫刻苦自立，而弟弟则成了一个好吃懒做、冷漠自私的赌鬼，是一个只知道无限索取的“活老鬼”。王大夫挣的血汗钱，本想给自己办一场简单有爱的婚礼，开一个让妻子成为老板娘的推拿房，然而，为了给弟弟还赌债，他只能用自己的鲜血来还弟弟欠下的债务。最令人心寒的是，王大夫给了弟弟两万日元彩礼钱，弟弟却嫌其他的盲人形象丢人，连他到婚礼现场的资格都给剥夺了。

这种被掠夺被侮辱被损害的残酷人生，在《推拿》里几乎无处不在。张宗琪的父亲后来找了个女人，这个恶毒的后妈对他：“小瞎子，你要是乱说，能毒死你，你信不信？”从此，张宗琪再也不敢和做他的女人说话了，过度防范也让他失去原本可以得到的爱；在推拿中心，高唯是前台接待，不是盲人。她表面真诚热情，其实是有权有势，她所有的友善不过就是为了谋取私利，不过就是为了实施自己的掠夺和报复。

毕飞宇写道：“在公众面前，盲人大多都沉默。”“后天盲人的沉默更像沉默。仿佛没有内容，其实容纳了太多的呼天抢地和艰苦卓绝。”小马就是一个后天盲人，他为失明自杀过，脖子上留下深深划痕。最终，他选择沉默，每天都在时钟的“咔嚓”声。这种沉默，就是对痛苦绝望的忍受和消解。在黑暗世界中，盲人用沉默抵抗着尖锐的疼痛，而这些疼痛往往正是来自所谓光明地带的人们。

认识了黑暗，才能读懂世界上所有的颜色。在浓厚的黑暗之中，有人可以把光明完整地送给你；日丽风和的现实之中，有人可能用黑暗将你笼罩得不见一丝光亮。在盲人世界的“黑暗”中，也可以看到爱与美，感受尊严与无畏；在繁华盛世的光亮中，也能够看见脏与丑，见证卑劣与怯弱。

盲人世界的“边缘社会”和健全人的“主流社会”，到底哪里才是光明的，哪里才是黑暗的，很多时候，就处于交错到葛状态。正如毕飞宇在书中说：“这个世界有人眼盲，有人心盲，眼盲的人可以用心去感受，心盲的人有眼也是摆设。”

海伦·凯勒在《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深情表达，如果她能拥有三天光明，她希望能够看到“人”，看清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世界，读懂自然和艺术的博大灵魂。盲人在黑暗中苦苦寻找光明，健全人却在光明世界制造黑暗。这说明，黑暗与光明，并不仅是由光影造成的，而是被心墙隔离出来的。

来此人间一趟，都想光芒万丈。一个失去悲悯和良知的社会注定没有光亮，一个轻易就践踏弱者尊严的族群只会泯灭人性之光。不论身处哪种地带，都应把光明完整地还给每个人，让人们一起走进有光的世界。这种光，就是毕飞宇在新作《欢迎来到人间》中所说的那种“只有被拯救的人才会有光，是大幸福，大解放”。

刻在文物上的文字，还原怎样的历史

——读《文物里的早期中国》有感



蒋敬诗

有诗人说，所有写在羊皮纸上的文字都是为了还原历史。那么，刻在文物上的文字呢？那些刻在甲骨、青铜器、简牍、帛书上的文字，又能为我们还原一段怎样的历史？是更精准？还是更迷惑？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还是在时间的洪流中默默地坚持真相？

一个名为林屋公子的网友，写了一本《文物里的早期中国》来回应这个疑问。他以侦探的视角，从多种有字文物中寻找上古及先秦传说所遗留的痕迹，试图通过一件文物解读它背后的政治制度、思想潮流和历史变化。

这或许是一种雄心勃勃的尝试。

从一般的规律而言，年代越近，历史的本来面目肯定就越清晰，特别到了文字书写已经覆盖了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时代，不同资料互为印证，兼听则明。但早期中国却不是这样，史料本来就缺乏，解读的方式也多种多样，甚至一谬千里的情形也不罕见，惟其如此，出土文物的

地位尤为重要。因为这些文物往往用于祭祀、祈祷等大型活动，本身就传达了更多信息，诉说了一段完整的故事。根据对这些实物文物的考据，再借助古籍及近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来还原真相，确实是一种逻辑自洽的考古方式。这种以文物解读文献的方法，使得许多模糊不清的历史事件的确得到了一种“看上去很清晰”的呈现。《文物里的早期中国》一书通过郭店楚简、清华简、吴钩越剑、马王堆帛书、三星堆铜人等具有代表性的34件出土文物，重新解读了汉代之前我们认为熟知的神话与“信史”，得到了一些与传统认知不一样的结论。

比如第3章，从陈侯因齐敦推断出黄帝的由来，就是本书呈现出来的一种典型的路径。作者从陈侯因齐敦上的铭文“绍缙高祖黄帝”入手，梳理了黄帝的字义与来源。在商代开始寻找黄帝的痕迹，但在《诗经·商颂·玄鸟》和《大雅·民生》这两则分别讲商周人族源的史诗中，均未找到黄帝的痕迹。作者继续往后寻找，在《史记·封禅书》和《五帝本纪》中关于五帝源起的回溯中，最终定位到黄帝的概念大约形成在战国时代。在这个过程中，作者指出，黄帝的形象被按照共同的文化心理需

要进行了塑造。在华夏国家与民族形成的过程中，华夏民族从形成之时就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因此，黄帝的由来并非单一的血统传承，而是文化的传承。

又如第25章中，作者从吴王夫差盃入手探究西施范蠡的传说。千古以来，西施和范蠡这对恋爱组合被视为是“神仙眷侣”的代表，他们泛舟太湖的情景象征着功成之后对权力的抛弃，从而实现了自身的自由。但作者却指出，在历史的真相中，西施和范蠡的故事可能并非如此美好。

首先西施和范蠡可能就不是传说中的人物，在真实历史中查无实据。其次，即使有这对人，他们也可能并没有归隐，根据各种史料推断，如贾谊的《新书·耳痹》中记载，越王勾践灭吴后，将帮助他灭吴的几位功臣都杀掉，范蠡是被扔到五湖（即太湖）中淹死的。西施的结局和范蠡也同出一辙，被扔到水中淹死。回到吴王夫差盃这件器物，其肩部有12个字的铭文，题刻道：“吾王夫差吴金铸女子之器吉”。有学者认为，这句铭文可能是用于赠送给吴王夫差的又一位来自民间的妃子，而此女子可能就是传说中的西施。这几乎是有关西施是否真实存在的唯一证据文

物。在我看来，浙江那些承载西施与范蠡传说的各类古迹并非牵强附会，因为这是文化的力量，代表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是对历史的一种再创作。

当然，作者的这种尝试也多少带有“民间科学”的色彩，他的著作还不能算作严肃的考古学术著作。比如，作者在论述某些问题时过于依赖考古发掘的文物，而忽略了其他方面的证据，这多少是一种“概念先行”。同时，作者太想证明文物和历史的关联性，有时会陷入一种“为了证明而证明”的循环中去，但真实历史的发生可能是混沌的，也许就是蝴蝶挥舞了一下翅膀导致一个时代的崩塌或者诞生。另外，书中对某些历史事件的解读也存在一定的主观性，为了观点的流畅而只截取某一方面证据。不过作者自己也说，《文物里的早期中国》只是一本从先秦秦汉文物中读上古史的“小册子”。既然是“小册子”，那就不用当史书看待，作为一部消遣类的科普读物，作者将考古研究与轻松的叙述风格相结合，使得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既能感受到学术的魅力，又能享受到“爽文”的阅读体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考古“民科”的魅力之所在。

余秀华携诗集《后山开花》归来

《摇摇晃晃的人间》《我们爱过又忘记》震撼诗坛的余秀华，已经8年没有新作出版了。日前，她的第四本诗集《后山开花》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大胆直白、热烈澎湃，与前三部现象级诗集一样，新作依然充满了典型的余秀华式表达，但也有读者表示，多少读出了诗人8年来经历的沧桑。

余秀华和她的诗歌曾在国内诗坛掀起浪潮。成名后，她并未停下脚步，继续在诗歌的世界里寻求更多的个人表达，继续用忠诚于自己的文字，抒发她对乡土、对世间的炽热的爱。本书收录了余秀华近年来新创作的诗歌150

余首，她的诗歌具有大胆绮丽的想象力，而她对生活苦痛的描述，力透纸背，光明坦荡，给人以生命的鲜活力量。

“网友的评价我原来很在意，现在看多了，我觉得不在意了。”8年里，我一直在写，有时候写得多一点，有时候写得少一点，每年都写，这是我个人的一种爱好，不可能不写。”近日余秀华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我所有的爱里面，对文字的钟情感久不衰，这是任何一段爱情都不能做到的。”

“新书里都是日常生活的表达，即便经历了许多事，但我诗歌里的情绪并没有特别大的改变。不过，

我更多在思考，我们看到的生活就是我们想要的吗？我们应该如何生活？如果有变化，我觉得是写得更成熟了，更理性了，更优秀了。对爱情的歌颂、对生活的热爱、对亲情的珍惜、对世界的赞美，这些从未变过。”她说。



电子书、有声书
扫码即可
阅读、收听

近悦近来书香重庆

书评投稿邮箱：cqrbdsb@163.com

【荐书台】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赵欣

“我想和你花儿凋谢之前狠狠相爱，狠狠互相索取，直到狠狠彼此抛弃，如同花朵一样新生，又如花朵一样死去……”（余秀华《秘密制造者》，摘自诗集《后山开花》）

凭借诗集《月光落在左手上》